

■作者·编者·读者

我为什么写《红火与悲凉》

□石 湾

当我写完《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书稿时,正值2009年6月,忽然想起,自我2004年6月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至今已经整整5年。我并不恋栈,但5年来,也许是几十年凝聚的文学编辑情结,文学出版界的历史云烟和时代风潮,依然时时刻刻在牵动我敏感的神经。尤其是2007年,《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四大名编”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我要为我所景仰的前辈名编立传的心愿,我也选择了四位名编,即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娘,写成了《也说京城名编》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刊出之后,接连有多位文学界的师友打来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些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那期报纸看。而那时我尚未收到样报,就想先找一张给病得已骨瘦如柴的江晓天看看。我找到邻居李兴叶先生,怎料他说:“这张报纸我不能给你,因为你写的四个名编中,有两个是有恩于我的,江晓天是我在新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还为我的长篇小说《帝国的草原》三部曲写过序。我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又是他推荐给李清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但对他俩在文学编辑事业上的成就我过去了解不多,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来……”过了些天,我又遇见他,再次说起这篇文章。他说:“可惜《文汇报》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整版的篇幅,让人看得不过瘾。你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一本20万字的书呢?”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这是因为《也说京城名编》原本写了近两万字,除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娘,还写了张羽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名编,但想在报纸上发表,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压缩到一万余字,所以才使他读罢有了一种“不过瘾”的感觉。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编何其多矣,即使是写二三十万字,恐怕也写不周全,无论遗忘了谁,都是一种不该原谅的憾事。于是,我就想,不如单写江晓天和萧也牧当年带领的那个出色的编辑团队。写这个团队的理由,我在《也说京城名编》一文的开篇,就提到了:

上世纪末,我在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

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萧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辑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兴叶很赞赏我的这个采写方案。于是,我就先奔江晓天家,开始了采访和资料的搜集工作。老江很谦虚,说:“你就不用写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写萧也牧吧。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红旗谱》的责编、《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人,‘文革’中又为保卫《红岩》被整死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编辑可以替代的!我觉得,你能为他立传的话,比写一个开国时的将军或省委书记还要有价值。”

老江这番真诚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的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就先围绕着萧也牧进行。可是,当一些重要的采访线索接连中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动手太晚了。最了解萧也牧的张羽和黄伊已不在世了,等我千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和萧也牧的大儿子联系上时,方知萧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准备采写这本书时含恨长逝了。加上一些杂务的干扰,使我的采访和搜集材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仍未能开笔。直到见到张羽的遗孀杨桂凤,得知张羽生前曾想写《萧也牧传》。她把张羽当年采访李威、康濯等一批采访记者慷慨地提供给我之后,我才知道以掌握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开始了《萧也牧悲剧实录》的写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丁玲、冯雪峰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终于梳理清楚了。而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公案,丁玲一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萧也牧悲剧实录》在《江南》杂志上刊出上篇时,我在首都图书馆借到刚上架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一书,发



原中青社文学编辑室部分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萧也牧、
张沛霖、张羽、王立道、江晓天、韦钟秀、毕方,后排为唐微风

现在这本厚达476页的传记中,竟还是把对萧也牧的批判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一章中。读罢此文,更使我感到,我动手写这本书尽管晚了,但毕竟是为把当代文学史中这页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了绵薄之力。

遗憾的是,我未能在江晓天在世时完成他的嘱托。虽在写成《萧也牧悲剧实录》之前,我陆续发表了《〈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和《一部〈红岩〉血凝成》三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萧也牧带领的那个团队所开创的部分红火的业绩,但直到江晓天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写出《江晓天的编辑生涯》,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行将搁笔之际,我不只叹息他们悲凉的命运,更感受到了他们那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我为有萧也牧、江晓天这样杰出的前辈同行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回顾这本书相当艰难的写作历程,也感到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以至细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采写他们的故事,我往往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创业艰辛、奋斗坎坷和成功喜悦。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相信,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萧也牧、江晓天他们编辑出版的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哺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职责和悲剧的力量,也一定会鼓舞我们去开创光辉的未来,迈向更加崇高的人生境界吧!

■土地与生长

时代的故乡

□白岩松

中国正处在历史上变化最激烈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虽然在其中改变着命运,却也不得不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随波逐流。

于是,太多的当代人,似乎首先没了故居,接下来没了故乡。人的生活半径变得比以往大得多,诱惑在哪里,哪里就是新的家。但是,这里,会是未来的故乡吗?

我们的心灵又在何处安放?

去年的夏天,我带着四个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来到我的故乡呼伦贝尔。那是草原上最好的季节,而对于飞机落地之前的客人们来说,却未必是内心最好的季节,每个人都忙,在北京这个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往往还未激烈争斗,就已感觉筋疲力尽,疲惫与焦虑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写在人们的脸上。

草原似乎是药。当这批人真正地行走在绿色的草原上,呼吸着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时,奇迹似乎发生了,我从他们的表情上判断,大家都已不像中年人,而像回到了少年。

在草原上的第一顿饭,酒还没有喝,当敬酒的长调响起时,一个孩子的妈妈瞬间泪流满面,这时,我知道,她落下了,心灵终于松弛下来,她已回家。

虽然我知道,呼伦贝尔只是我的家乡而不是她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更多的人都被草原感染,都已松弛下来。每一个人心中,原来都有一个草原,这呼伦贝尔,分明是大家的故乡,甚至就是这个时代的故乡。

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片大自然的绿色,而《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歌。到了呼伦贝尔,总会有人在唱,你会不止一次地听到,然后觉得,没有比这再好听的旋律,于是,这首歌与这草原就再也分不开。

而现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又变成这样一本书,在作者巴义尔笔下松驰,清新,充满有趣的细节。它从大自然进入,然后行走在历史当中,就如同这一片土地,仿佛简单却又深藏不露。一年四季变幻的颜色,如同历史中变幻的大旗,让你不会感觉单调,当然,也不会像现代人一样的自大无比。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不仅在于上天的给予,更在于一代又一代人的滋养,历史是枝最好的笔,负责任地刻画了一切。

人过四十之后,总有人问我:你的故乡和草原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回答:那是我少年想离开而现如今每时每刻都想去的地方。

乌镇的魂

□邹海仑

乌镇的魂,
摇摆船家剽悍的身影里
竹篷船霍然一转,船尾剪开一河新绿……
乌镇的魂,
氤氲在蓝花酒盅浓烈的醇香里
蓝字的酒旗随风摇摆,召唤着八方热爱生活的兄弟……
乌镇的魂,
叮咚在银匠清朗的锤声里
佩在孩子胸前寄期望,戴在情人手上写甜蜜……
乌镇的魂,
潋滟在水边人家的门墙上
伸伸缩缩的波光,把梦和诗从白天一直编织到夜里……
乌镇的魂,
朴打在染坊百尺竿头
欢乐的彩布,从少女的怀抱直通青天云霓!
乌镇的魂,
悬挂老胡开文笔店
三千枝新笔催动千军万马,激扬起流畅豁达的文气!
乌镇的魂,
凝结在茅盾老主编故居的墙壁上
那向你瞩目的殷殷目光,已经望了一百年
未来的一千年,还会年年岁岁
瞻望下去……
乌镇的魂呀——
乌镇的魂,
当我在河边茶楼上凝神静坐的一小时四十分钟里
你被那穿堂而过、鼓荡不已的“千里快哉风”
吹进了我的心胸
从此在那里坐定 坐定,
永世不移!

注:茅盾曾担任《世界文学》杂志第一任主编,本诗作者现为该刊编辑。



原上草
江南水乡速写(水墨)
刘玉山作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21期·

3
印象
怀念袁和平

福建作家刘登翰来信来电,嘱我为老友袁和平的文集写一篇序言,并认定“这篇序只有你来写最合适”。读到登翰的信,下意识地想起1997年11月7日,我兼职《诗刊》主编刚到任,突然接到登翰电话,说和平逝世了。这是我到《诗刊》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居然就是和平的噩耗,斯时和平48岁,与今年中秋前夕刚刚辞世的《诗刊》副主编刘希全同龄,莫非48岁是优秀作家生命的一道坎?

收入本文集中150万字的著述,可以看出和平的兴趣所在。他擅写长篇、中篇小说,对报告文学也有兴趣,同时文化随笔亦有涉猎。和平的知识结构很杂,天文地理、诸子百家、收藏绘画,乃至阴阳占卜等,无所不精,而他最上心、下功夫最多的却是环境问题。如今环保已是一门显学,可二十多年前大家关注的热点绝不在其列,这显示出了和平目光的锐利、见地的超前,也让人们看到一个优秀作家超越时空的才情。

和平、秦文玉、我和范向东,四人曾同居北大一间学生宿舍,我与和平上下铺而卧,每当夜静,室友闲聊,均以和平为中心。他那时魁梧壮硕,且有过内蒙古草原放牧的生活经历,见多识广,文玉、向东多年在西藏,我故乡在内蒙古而成长在云南,大家共同话题极多,聊得兴起,便买啤酒小菜,快活地喝上一通,那真是段让人怀念的时光。在这个集体中,和平是班长,文玉是支部书记,所以我戏称自己是“党政一把手”的室友。如今文玉、和平先我而去,想来不禁黯然神伤。文玉因车祸在福建去世,和平当时也在车中,还有另一位作家陈章汉。文玉走时是在1994年的10月,刚刚46岁,我与和平把他推入火葬炉中,然后看着一缕白烟过去,文玉变成一捧骨灰;这一幕不料想三年后又在和平身上重演;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场景,甚至骨灰盒的都是同一个人。自此之后,我陡然感到自己对生命有了一番彻悟。两个好友兼兄长的壮年辞世,在展示生命残酷一面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该不该做些该做和喜欢做的事,否则……

和平文集中的这些文字,莫不凝结着他的心血,有些文章(譬如中篇小说《佛手》)我曾替他誊抄过,因为那时没有复印机,和平求我抄稿时很腼腆,但谁叫他是我的班长、兄长兼偶像呢!遂快乐为之效力。这部中篇后来发表在《十月》上,一度影响很大,因为和平把对茶文化的研究心得全熔铸在这部小说中,后来他还把我们几人邀请到铁观音的产地——福建安溪进行实地考察,一路品茗一路赏秋,遂记住了几个地道的茶名:秋香、黄桂。和平先我为培养我的茶趣,还不断附上茶叶,所以在喝茶方面,他是我的导师。

和平的长篇小说《蓝虚》和《南方的森林》是最能体现他本人艺术追求的,他和我一样喜爱前苏联作家普列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我们曾就这一现象进行讨论,这两位是风景描写大师,从和平的小说创作中,能读出这种师承。一个外貌粗犷豪迈的汉子,内心却细腻温柔,落在纸上的文字,又透着南方的水气和雾气,甚至有着森林深处的清香,这就是袁和平的魅力。

和平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在他离去的日子里,中国和世界乃至文坛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和平生前曾坚守并追求的那些理念,譬如环境保护、美丽心灵与自然的融合、天人合一、茶禅一体和快乐原则等,没有因时代变化而变异,反倒让人们更加认可和珍惜,从这个意义上说,袁和平并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中间,而且将伴随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在悠远深邃中凸显出别一种力量。

■艺文空间
刘玉山的美术天地
□冯立三

在我置放座右铭的地方,悬挂着一幅80公分宽、65公分高的大色块拼积的彩画。高远之处铺满殷红,似是辽阔天空;左下一片浓绿,似是从高天俯瞰之广袤森林;右下凸现赭黄,似是移自秦晋高原;其他小色块点染其间,似喻世界之多色;做涌动状的,似是白浪翻腾。这是刘玉山送我的手机作画,由我放大之,配金色框,置于东墙上,我以油画视之,可寄托心志,陶冶性情,开阔心胸。只是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接近他创作的初衷。但就某种艺术美学而论,艺术的意义不就是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之间的双向建构吗?

我曾经多次观摩刘玉山的画展,一次在美术馆,一次在美术学院,两次在宋庄水墨艺术空间,也看过他多部画册和他的四中校园雕塑,以及他的散文著作、文艺随笔和文艺批评著作。对他的画作和其他艺术创作,留有深刻印象,其中尤为过目不忘的:

北京四中无名志士纪念碑。由新四军军帽、工人帆布手套、北京四中校徽、献词和一束山里的野菊花组成的这座锈铜花岗岩雕塑,朴素之极,凝炼之极。一部百年历史,竟然由一顶新四军军帽、一双工人帆布手套表现之、抽象之、象征之。艺术不妨华丽,也可以朴素,朴素是艺术的高境界。纪念碑使用“泰山红”色、铸铜色、绿色、黄色、白色,色彩丰富而和谐,与其背后真实的雪松、草坪、长廊亦浑然而成一体。纪念碑成为四中校园重要的文化景观,引人注目,惹人遐思。这是怎样慷慨悲壮的史诗,又是怎样豪迈朴素的现实,以及用以寄托光辉未来的美与力的交相和鸣呀!

刘玉山告诉我雕塑所用之花岗岩来自山东泰山,“泰山红”质坚色美,是颇负盛名的泰山之石。新四军军帽、工人帆布手套、野菊花都是依据实物模铸而成,使人备感诚朴,备感真实,同时诉诸情感与理智,容易感动人心。一束山里野菊花,使这种对先辈的纪念和感恩,具有为松柏、牡丹等高洁、富贵之物所难于充分表达的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道德光辉,表达得震撼人心!四中校友刘玉山、四中校长刘长铭以及其他参与此事者,做事认真,思考绵密,寄意深长,确乎令人感动——他们懂得如何以最具吸引力的艺术方式,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历史、文化以及审美的教育。这应该是教育家和艺术家联袂创造的近年来崛起的校园中的奇葩。它在北京四中百年校庆日揭幕,使它以磅礴的历史情思和深刻的感召力载入史册。任何心智正常且善于思考历史的人经过它的面前,都不会无动于衷。揭幕时刻,我本人亦曾肃然而立,脱帽致敬,亲身感受它对自己的无声的洗礼。宋庄水墨艺术空间刘玉山画展开幕,霍然想起他的这座雕塑,想象中重睹芳华,又有刘玉山、刘长铭在侧,深感这座平易肃穆的雕塑,对一代代四中学生的成长必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文化引导人类,此之谓也。

戈壁滩上的胡杨。画中胡杨拦腰折断,恰成人体字形构图,树之两侧一深一浅,一明一暗,左侧粗干斜立,右侧虬枝无存,断裂处,上有断茬分明,下有骨肉相连。背景苍茫,一片凛冽的蓝。胡杨造型,如人腿之分立,坚实稳重,寓意不以单纯讴歌大自然的生命力为限;或可同时寓指人被大力击倒,稍作喘息,即重新崛起,这又分明构成一个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香港政府驻京办事处任晓洁女士曾作诗赞扬这幅水墨胡杨:“雷落九天意欲杀/风捲大漠万重沙/铁干横断犹不死/虬枝无存蓄新芽”。画作笔墨遒劲,构图简洁,色彩明丽,气势磅礴;诗作得其神韵,“铁干横断犹不死,虬枝无存蓄新芽”,可谓画龙点睛,锦上添花,成为绝配,诚然好诗。此胡杨不妨看做我们民族永不衰竭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永不屈服于苦难、打击的刚烈、柔韧的民族性格的一种象征。

香格里拉的老妈妈。这幅水墨画以雪山为背景。老妈妈背脊之上是大块的金黄的秋叶。那雕刻着劳动者几十年